

贺词领航青春路 深耕实践建新功

王正杰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习近平主席2026年新年贺词以温暖而坚定的话语,回望“十四五”收官之年的辉煌成就,展望“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奋进征程,号召全体人民“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更是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接力奋斗的现代化。作为新时代青年,唯有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创新攻坚、基层实践、文化传承、开放共赢的赛道上勇毅前行,方能不负时代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以创新之姿赋能高质量发展,是青年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强调,“我们依靠创新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并细数天问二号“追星”、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入列等重大科技成就,彰显了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青年是创新创造的生力军,新时代的科技创新浪潮中,无数青年以敢为人先的锐气,在关键领域突破攻坚,用青春智慧书写创新篇章。90后青年创业者王兴兴,带领宇树科技深耕智能机器人领域,2025年发布首款轮式人形机器人G1-

D,攻克传统机型稳定性差等行业痛点,核心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产品落地工业、救援等场景,以硬核创新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彰显青年担当。青年唯有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将专业所长与创新实践深度融合,才能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彰显青春的创新价值。

以实干之力扎根基层一线,是青年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新年贺词中“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的嘱托,深刻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广阔舞台。新时代青年主动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乡村社区、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实干为基层治理赋能、为民生福祉添彩。2025年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洛古有格,作为凉山州三河村走出的首个大学生,用返乡创业的实干担当给出了生动诠释。他放弃国企的稳定工作,回到海拔2500米的家乡深耕养殖业,牵头成立养殖合作社,攻克技术、资金等难题,打造标准化养殖场,带动450余户村民养殖乌金猪、西门塔尔牛。通过“合作社+农户”模式与“种养文旅融合”发展体系,他让村集体经济增长197倍,脱贫户人均纯收入大幅提升,用扎根乡土

的坚守与实干,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从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到基层治理的第一线,青年以实干践行初心,用脚步丈量民情,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以传承之责树立文化自信,是青年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新年贺词中提及的“文博热、非遗热持续升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蓬勃生机。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青年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桥梁,既要守护好中华文脉的根与魂,更要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共生。侗族大歌非遗传承人、95后青年杨想妮以传承创新践行文化自信,返乡创办非遗研学基地,运用数字化技术留存侗族大歌原生态资料。2025年,她带领“舞乐蝉歌”乐团为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制作核心配乐,还跨界与游戏厂商合作推出主题音乐,让这一古老艺术借力现代载体破圈传播,在守正创新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青春活力。青年唯有主动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创新者,才能不断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深厚的精神滋养。

以开放之怀拥抱世界舞台,是青年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担当。新年贺词强调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新时代青年立足全球化视野,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搭建合作桥梁,在国际交流中展现中国青年风采。“筑梦丝路”青年发展计划由共青团中央、国务院国资委、国铁集团合作主办,2022年3月启动实施。计划围绕就业创业、文化交流、国际传播、志愿服务等方向,联合央企与海外友好机构推进合作,组织中外青年共建志愿服务队伍,开展科创赋能、技能培训等活动。截至2023年,计划已实施30个国际合作项目,覆盖19个国家,惠及青年近9万人次。青年的开放视野与国际担当,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更好惠及世界,也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主席2026年新年贺词的奋进号召,为青年在“十五五”开局之际明晰方向、校准坐标。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当以专业所长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扎根基层治理调研实践、锤炼知行合一本领,厚植家国情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青春之力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书写时代答卷。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城市高效能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范恒山

“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城市治理是贯穿城市规划、建设、运行全过程的一项永续性的工作,对城市发展起着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城市治理的成效既体现在运行质量和效益上,也反映在城市形象和人的精神感受上,是导致城市发展快慢优劣的最直接的因素。2025年8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要加快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此,应当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优化思路与路径,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实现城市的高效能治理。

注重治理投入,扭转“重建设、轻治理”的倾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城市发展规律,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城市结构优化,城市品质提升,城市能级拓展。但要看到,我国城市发展很不平衡,在城市整体持续向好发展的同时,也有部分城市陷入困境:速度放缓、运行乏力、动能减弱、后劲不足、病灶滋长、产城失衡,有的由先进变为落后,有的出现萎缩与衰退。

同时还要看到,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主要体现为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粗放外延式发展的特征依然十分明显,与之相配套的是城市管理部门存在的“重建设、轻治理”的倾向。这种粗放发展除了表现为“大规模增量扩张”外,也从城市生产生活生态各个维度鲜明地反映出来。从现实看,存在着不少突出矛盾与问题。例如:热衷于大拆大建,不分国情,一律搞大广场、宽马路、高楼群、阔社区,割断了传承,也抹去了特色,导致“千城一面”;无视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热衷于发展高大上产业,导致产业发展的同质化,并因此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影响了产业内在创新性和市场竞争力;为寻求高端大气上档次,随意禁止“地摊经济”等大众经济的发展,既弱化了城市应有的烟火气,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城市建设为追求城市格局,

导致市民工作生活大跨度、长距离运行;一些城市注重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等等。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城市治理的不足,在这方面“雷声大,雨点小”和“言胜于行”的色彩比较浓重。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抓住城市治理这个关键。换言之,没有高效能治理,就不可能有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从城市发展大势看,现在到了将城市工作重心转向高效能治理的时候了。经过70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城镇化已步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截至2024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7%,超过9.4亿人口在城镇工作和生活。202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作出了两个转向的判断,即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实现城市发展转变的关键就在于重视和优化治理。《意见》明确要求,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要坚决克服“重建设、轻治理”的倾向,把加强治理、形成高效能治理作为城市工作的重中之重。

明确战略取向,聚焦关键方面提升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召开的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形成高效能治理指明了根本方向和基本路径。特别重要的是,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

202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把握城市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结合中国文化遗产和制度要求等认识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可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归结为三个关键词,即发展力、愉悦度、安全性。

发展力,即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发展的内核是产业发展。发展是城市运行的基础,没有发展,一切将无从谈起。发展不能是断断续续的,也不能是主要依赖于外部条件支撑的,必须

是可持续且有强劲动能作支撑的强劲发展。发展力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愉悦度,即市民幸福度。它体现的是城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是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一体呈现。情感愉悦度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安全性,即安全韧性。它体现的是城市抗灾释压化解风险的能力,是风险预测能力、应急响应能力、精准管控能力和救援恢复能力的综合体现。高度安全性也应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强劲发展力、超强愉悦度、高度安全性,构成了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基于这样的考量,城市治理至少应围绕如下关键方面用力下力。突出地理特色和文化遗产,努力打造个性化的城市建筑风貌和空间格局,形成别具一格的城市风采。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充分利用现有发展基础和资源潜力,打造特色鲜明、韧性强劲、富有竞争力和增值性的产业结构。统筹工作与休闲需要,合理划分和布局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减少长距离跨越和强制性绕行,提高便利性,增强效率性。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把让市民创业更方便、生活更幸福贯穿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使城市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强化“人民是城市主体”的意识,最大限度赋予全体市民“激情创造,愉悦生活”的行政管理与服务空间,鼓励、推动和支持市民自主、自力和自律开展增进城市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类经济社会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强化文明建设,打造开明包容、创新奋进、诚实守信、互助共济的诚信社会,建立具有独特韵味的社会文明高地。强化基础设施与落实运行管理责任并举,构建精准管控、快速反应、有力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持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优化机制体系,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

城市治理重在务实,成在精细,难在持久。在转变观念、将治理摆放在城市工作第一位置的同时,应着力于解决“粗放发展、华

而不实”问题,完善城市治理运行机制和工作体系,真正实现城市的高效能治理。综合把握,在实际工作中应着力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多元参与与协调联动契合。城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仅仅依赖于某一个方面,不仅会有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之感,也会出现防不胜防、“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漏洞。城市治理需要各方面参与。政府部门作为主导者,不仅要落实责任、创新方式,扎实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大力推动其他城市主体,特别是广大市民积极投身城市治理,形成齐抓共管互促的局面。与此同时,要做好统筹协调,推动各治理主体同频共振、高效联动。

二是政策法规引领与技术数据支撑联袂。完善城市运行法规,明确行业界限,优化政策安排。强化现代技术与城市治理的及时、无缝对接。打造集约统一、数据融合、传输便捷、高效协同的城市数字底座,实现城市全程数字化转型,使数据与智慧手段成为优化政策、落实政策和实施协调治理、精细治理的关键支撑。

三是广疏解与微更新并重。美化城市风貌,构建产业特色,化解安全风险,都需要进行城市格局调整。运用好城市更新政策,结合功能优化、产业转移承接、新区建设等举措对城市“三高”(建筑物密度高、居民小区楼层高、各类人员聚集度高)“三差”地带(社区老、道路窄、环境乱)进行调整与疏解,优化建筑格局、社区规模、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注重用微更新手段美化城市环境,增加温馨元素,强化安全性,微更新住往是付小功成大事,更能给市民增加愉悦,给城市带来韵味。

四是物理手段运用与精神文明建设一体。空间布局、建筑格局、街道分布的调整和场馆馆所的建设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不可或缺。但这类物理性质手段的治理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根本的。城市良好治理的坚实基础是市民素质和城市精神,唯此才能推动物理手段的科学运用,并基于治理把积极参与和自觉维护有机统一起来。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

郑州城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跃升之路

韩枫桦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郑州的实践探索,是一场以基层治理现代化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为内核、以制度创新与技术变革为驱动的深度变革。当这一源自浙江诸暨的治理智慧跨越地域边界,如今在中原腹地的郑州落地生根,它不仅完成了文化语境与社会结构的本土化调适,更催生出一套全新的治理形态——“社区合伙人”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跃升。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模式,构建起政府、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格局。

“枫桥经验”至“社区合伙人”的兴起

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中原城市群核心引擎,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人,城镇化率超过80%,社区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然而,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统筹能力相对薄弱,居民自治组织治理能力不足,社会矛盾发生率较高。老旧小区改造争议、物业服务质量纠纷、邻里关系紧张、流动人口管理难等问题频发,若处理不当,极易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或长期积怨。如何让“枫桥经验”真正融入城市肌理,转化为可操作、可持续的城市治理方案?在此背景下,一种名为“社会合伙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正在悄然兴起。这一模式借鉴了“枫桥经验”中群众参与的核心精神。

“社区合伙人”的兴起,源于郑州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求。所谓的“社区合伙人”,是指由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

“枫桥经验”至“社区合伙人”的跃升

从“枫桥经验”至“社区合伙人”的进阶,并非偶然,而是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社区合伙人”不仅体现了社会治

理理念的进步,更彰显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活力与智慧。

党建引领是“社区合伙人”创新模式有效运行的政治保障。郑州坚持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全面推行“社区大党委”制,由街道党工委牵头,整合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资源,构建区域化党建联盟。在此框架下,社区党组织不再是孤军奋战的“战斗堡垒”,而是多元共治的“指挥中枢”。例如,金水区推动治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治理”,激活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通过党建引领把“问题清单”变“幸福清单”,明确各成员单位在环境整治、安全巡查、困难帮扶等方面的义务,并设立“红榜积分”制度,对积极参与治理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荣誉激励和政策倾斜。这种组织重构使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社区合伙人”机制方向不偏、动力不竭。

人民主体地位的回归,则是“社区合伙人”机制的灵魂所在。郑州“社区合伙人”强调的“多元共治、协同互动、法制保障”,不再是简单发动群众协助政府工作,而是赋予群众真正的决策权、监督权和评价权。如管城区、中原区等社区设立“小院议事厅”“民情恳谈会”“楼栋长轮值制”,定期围绕公共事务开展协商讨论。再如二七区某老旧小区在加装电梯过程中,因楼层利益差异引发激烈争执。社区党组织及时介入,组织“社区合伙人”中的居民代表、法律顾问、设计单位召开五轮听证会,最终形成兼顾高低楼层利益的分摊方案,并由社区基金会提供部分资金支持。过程公开透明,群众全程参与,不仅顺利

推进项目落地,更增强了邻里互信。这正是“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就地解决”的生动体现。

科技赋能则为“社区合伙人”创新模式插上了智能化翅膀。面对海量信息与复杂需求,传统人工管理模式难以胜任。郑州依托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政府改革,推动“互联网+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全市以“1+4+N”(党建网+政务网、物联网、视联网、数联网+N个专网)建成统一的四级新型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创新“管党决策、党管治理、党管数据、党管平台”等“一委一办一平台”机制,建立“大数据中心”“新型智慧城市中心”,集成网格化管理、民生服务、应急响应、舆情监测等功能模块。每个社区配备专职网格员,配备移动终端设备,实现事件上报、任务派发、处置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更重要的是,平台打通公安、民政、卫生健康、教育等部门数据壁垒,建立重点人群动态数据库,运用AI算法进行风险预警。例如,系统可自动识别独居老人连续多日未出门的行为异常,触发社区志愿者上门探访;也可通过对12345热线数据的语义分析,提前发现某片区物业管理投诉集中趋势,提醒“社区合伙人”团队介入协调。科技手段让治理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防,极大提升了响应精度与效率。

“枫桥经验”至“社区合伙人”的启示

“枫桥经验”至“社区合伙人”的兴起,对城市治理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提高了社区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还促进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and 居民的幸福生活。

从更深层次看,“社区合伙人”模式之所以能在郑州焕发活力,源于其顺应了现代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当“社区合伙人”通

过项目化运作、常态化活动,重新编织起社区的社会网络。无论是共同策划节日庆典、组织亲子阅读会,还是联合开展垃圾分类宣传、电动车安全隐患排查,每一次协作都在积累社会资本,培育共同体意识。如一位参与社区微更新项目的年轻设计师坦言:“以前我只是个租户,觉得社区好坏与我无关。现在我是‘空间美化合伙人’,看着自己设计的花坛被邻居点赞,突然有了归属感。”这种情感认同的重建,正是基层治理最宝贵的软实力。

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实质是一部中国基层治理理念与方法不断创新的历史。从最初的群众路线实践,到改革开放后的综合治理模式,再到新时代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其生命力正来自于与时俱进的适应能力。郑州的“社区合伙人”模式,正是这一经验在特大城市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它不仅继承了“矛盾不上交”的底线思维,更拓展了“风险早防范”“服务零距离”“幸福共缔造”的高线追求。如果说传统的“枫桥经验”侧重于“治已病”,那么郑州的“社区合伙人”则致力于“治未病”与“强体质”并重。

当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郑州的“社区合伙人”模式重塑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它标志着治理逻辑从“管控型”向“服务型”、从“命令式”向“协商式”的根本转变。政府不再包揽一切,而是扮演平台搭建者、规则制定者、资源调配者的角色;社会组织不再是依附性的执行者,而是专业化的服务提供者;居民也不再是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而是主动的治理参与者。在这种新型关系中,各方形成了稳定而富有弹性的治理生态。

(作者单位:郑州市委政策研究室)

从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的农业曙光,到商代亳都的王朝肇始;从春秋郑韩的礼制创新,到唐宋时期的文脉绵延,直至明清的市井烟火,郑州完整见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在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宏大背景下,如何系统挖掘、活态传承这份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度融入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肌理,是郑州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历史经纬:郑州——实证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核心地标

郑州并非仅有“火车拉来的城市”这一现代标签,它更是一座被考古学重新定义的“文明渊薮”。其历史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在于于时代序列完整、文明地位崇高、文化内涵多元,构成了理解中华文明的主轴。

文明肇始:从旧石器到“早期中国”的孕育。距今约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郑州地区已有人类活动。至新石器时代,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的先民,率先完成农业革命,种植粟稻、酿造米酒,聚族而居,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晨曦”。紧随其后的大河村文化(仰韶时期)彩陶上的星象图案、清静沟遗址的大型环壕城墙,展现了先民的天文观与复杂社会形态。登封王城岗遗址可能与“禹都阳城”相关,标志着中原地区在龙山文化晚期已迈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为夏王朝的诞生铺就了前夜。

王朝基石: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与文化奠基。尽管夏代都城二里头位于邻近的洛阳偃师,但郑州地区无疑是夏文化的重要分布区。至商代早期,郑州迎来其历史上第一个巅峰——郑州商城。这座面积达25平方公里的宏大都城,拥有宫殿区、手工作坊区、祭祀区及成熟的水系网络,出土的杜岭方鼎昭示着青铜礼乐制度的成熟。近年发现的书院街墓地及“金圃面”,更是将高等级丧葬制度、黄金文化与可能的跨区域交流实证提前至商代早中期。西周初期,管国故城的设立,使“管”这一地名延续3000年,成为郑州城市发展的地理原点。

轴心激荡:春秋战国至秦汉的融合与定型。东周时期,郑韩故城作为郑、韩两国539年的都城,成为中原政治与文化的焦点。子产“铸刑鼎”推动成文法公布,“不毁乡校”开议政新风;为“疲秦”而修的郑国渠却意外强秦,历史的吊诡在此长存。秦汉一统,郑州地处天下之中,荥阳敖仓成为帝国粮储枢纽。刘邦郡将纪于荥阳舍生取义,其忠烈故事演化为中国城隍信仰的重要起源;东汉密县县令卓茂行“君子之治”,彰显儒家德治理念。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陶仓楼、画像砖,生动刻画了“事死如生”的世俗生活画卷。

文脉绵延:唐宋至明清的融合与烟火气。唐代,郑州虽非两京,但作为荥阳郑氏等顶级士族的郡望,孕育了“诗书画三绝”的郑度等文化巨子。宋代,巩义北宋皇陵依山而建,其石刻艺术堪称瑰宝;文坛领袖欧阳修归葬新郑,士人精神于此长存。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汉阙、少林寺、观星台等)在唐宋时期体系臻于完备,完美诠释了“中”的宇宙观与政治哲学。明清时期,郑州作为区域性商贸枢纽、高拱等名臣的故里遗存,以及城市街巷中留存的老地名、会馆、民居,共同诉说着近代市井商业文化的繁荣。

综上,郑州的历史文化脉络,是一条从未断绝的文明发展线。它从万年前的农业起源,到5000年前的城市萌芽,再到3600年的都城创立,直至作为“天下之中”的持续繁荣,为当代城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文化深度、精神厚度与认同基石。

现实镜鉴:中心城市建设中的文化遗产困境

在国家中心城市快速推进“东强、南动、西美、北静、中优、外联”空间布局的进程中,深厚的历史底蕴既是独特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在:

遗产的“隐匿性”与城市形象的“模糊性”矛盾。相较于西安、南京等地表迹迥异的古都,郑州的辉煌大多深埋地下(商城、郑韩故城)或呈土木结构(遗址),视觉冲击力弱。这导致“商都”文化标识在公众认知中不清晰,“古都”形象被强大的现代交通枢纽、商贸中心形象所遮蔽,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匹配。

保护的“原真性”与发展的“扩张性”冲突。城市扩张、轨道交通建设与地下文物埋藏区高度重叠。如何在推进32个核心板块建设、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过程中,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一张图”,避免建设性破坏,是持续的挑战。

利用的“浅表化”与传承的“内涵性”脱节。当前保护利用多停留在遗址公园建设、博物馆展示层面,对文化遗产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如“中”的智慧、子产的改革精神、兼容并包的气度)挖掘阐释不足。文旅产品存在同质化倾向,未能将独特IP转化为国际消费吸引力、产业驱动力和品牌影响力,与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存在差距。

融合路径: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战略与实践

必须摒弃将文化遗产视为孤立“盆景”或发展“包袱”的旧观念,转而将其视为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与“资本”。

空间融合:实施“考古遗址公园+”与“城市记忆修补”计划。打造文化地标集群:提升商都遗址博物院及周边环境,联动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仰韶文化)、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形成展现中华文明主根的“考古文化走廊”。在老城区,通过标识系统、小微博物馆、街景艺术,活化“管城”历史街区的记忆,让历史可阅读、可漫步。

创新遗址展示模式:借鉴国际经验,对重要考古遗址(如书院街墓地)可建设沉浸式保护展示厅,运用AR/VR技术再现历史场景,将专业性考古资源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文化体验。

产业融合:构建“文化资源IP化—IP产品化—产品产业化”链条。赋能文创设计与数字经济:建立郑州历史文化数字资源库与IP库。鼓励从商周青铜纹样、唐宋石刻艺术、宋代美学中汲取灵感,开发高附加值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动漫影视作品,建设“元宇宙商都”,打造沉浸式数字文旅新业态。

(作者单位:郑州市审计局)

根植历史沃土，擘画文化强市

乔德宁